

选 择

邦 达 列 夫 著

当 代 苏 联 文 学

DANGDAI SULIANWENXUE

安徽人民出版社



选 择

邦 达 列 夫 著

王 燎 潘桂珍 译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ВЫБОР

根据苏联《我们同时代人》第10、11期译出

选 择

邦达列夫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37×1092 1/32 印张: 15 插页: 1 字数: 287,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6,000

统一书号: 10102·1019 定价: 1.15元

译 本 序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是当代苏联著名作家，1924年生于乌拉尔的一个职员家庭。1942年从中学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194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战后于1946—1951年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

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多以战争为题材。中篇小说《指挥官的青春》(1956)，表现炮兵学校学员生活。中篇小说《营请求火力支援》(1957)，描写苏军一个营强渡德聂伯河后，由于得不到火力支援，战士们浴血奋战，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这部作品使作家一举成名。中篇小说《最后的炮轰》(1959)描写苏军某炮兵连在波兰、捷克交界的一个小城截击德军的一场战斗，表现战争与爱情、战争的残酷和人性力量的“悲剧冲突”。这部作品同巴克拉诺夫的中篇小说《一寸土》以及贝科夫的中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被评论界称之为“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品。

六十年代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寂静》(1964)和《热的雪》(1969)。《热的雪》被苏评论界誉为写战争的“全景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1970年还创作了电影史诗《解放》(与Ю·奥泽洛夫、О·库尔加诺夫合作)，拍成电影，获1972

年度列宁文艺奖。

1975年发表长篇小说《岸》，小说以主人公尼基金与爱玛之间的爱情作为故事的主线，描写了尼基金的两段生活经历：中尉尼基金在卫国战争后期和德国少女爱玛的爱情，战后七十年代成了名作家的尼基金应邀到西德汉堡进行东西方“友好对话”和“文化交流，”又和爱玛重逢。小说发表后获苏评论界好评，认为它“在缓和与共处的条件下……对时代的根本道德伦理问题作了回答”，反映了“进步人类正在热切探索和寻求的缓和途径”的长篇小说。小说获1977年度国家文艺奖。近年来小说先后搬上了舞台和银幕。最近几年邦达列夫不断发表一组一组的抒情短篇《瞬间》。作家说：“我希望在这部作品中能够概括一个被捕捉到的真实的瞬间，使人们的感觉更加敏锐，迫使他们去反省”。1980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选择》。

小说《选择》是一部描写当代苏联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作者试图通过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对当今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哲理性探索，如人生的意义、幸福的真谛、战争与和平、生与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人们的命运、艺术的使命等等。这些问题是通过各种人物长达四十年间的人生舞台上的活动展现的。这里有对战前生活充满感伤情调的回忆，有空前残酷的反法西斯战争场面，也有科技进步时代苏联和西方现代化大城市生活的紧张节奏。复杂的主题，众多的人物和多变的情节被一条红线串连在一起：人们在自己生活的关键时刻，在自己的日常生

活之中，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政治上、道德上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将决定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也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命运，它同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曾对参加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演出的莫斯科小剧院演员们说：“不管人们对选择作何解释，选择——这永远是一个难题，因为人们的本质不是单一的。”

《选择》中的两位主要人物——瓦西里耶夫和拉姆津是在莫斯科河畔的一个旧式楼房里一起长大的，他们曾在一个班里上学，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在一个炮兵连里并肩作战。这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受过同样的教育，有着共同的理想，甚至都爱着漂亮的女同学玛莎，然而，在1943年的乌克兰前线，在那一次血腥的战斗中，两位朋友分手了。这次分手一别，竟达近四十年之久。当他们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威尼斯重逢时，瓦西里耶夫已经是国际闻名的画家，而拉姆津则是相当富裕的西方商人了。小说的矛盾冲突正是从两位朋友的重逢的时刻展开的。

拉姆津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被一位驼背的德国女人从集中营里挑选出来，先是充当她的佣人，战后便成了她的丈夫。拉姆津不敢回到战后的祖国，因为苏联当局当时对待当过俘虏的官兵的政策是十分严酷的。他留在异乡，有了儿子，在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规律支配一切的社会里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绅士。

瓦西里耶夫在那次战斗中也身负重伤，但他没有被俘。战后，他进了美术学院，刻苦学习，成了很有名望的画家，

同玛莎结了婚，有了女儿，还经常出国举办个人画展。

当两位老朋友重逢时，在充满矛盾冲突的当今世界的政治气候支配下，青梅竹马时代的温情早已烟消云散，过去的朋友变成了貌合神离，各怀戒心的两个世界、两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思想感情使这次会面给两个人都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不久之后，拉姆津以外国旅游者的身份重返故乡。他看到了祖国，但祖国把他视为外国人，他探望了孤独的老母，但母亲不能原谅他的无情，他同瓦西里耶夫会面，但是，在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当年那种推心置腹的交谈了。拉姆津认识到，对于一个人来说，失去了祖国和母亲的爱，失去了生活的理想是多么可怕的悲剧。他看不到挽回自己过失的出路何在，最后选择了自杀这条绝路。

瓦西里耶夫过去和现在都不认为拉姆津是个胆小鬼和十足的坏蛋，但是，他也不能理解和原谅自己这位朋友所选择的道路。在作者笔下，作为一位苏联公民和艺术家，瓦西里耶夫是以拉姆津的对立面出现的，但瓦西里耶夫并不是拉姆津的裁判者，也不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也从未板起面孔教训过别人。恰恰相反，瓦西里耶夫自己对人生的意义、艺术使命、幸福的真谛这些问题并无胸有成竹的答案，他也常常因为找不到满意的答案而苦恼，因而他也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着人生意义的奥秘。尽管瓦西里耶夫不是一个完人。但他同拉姆津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有为祖国和人民献身的明确的生活目标，他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他有知心朋友——画家洛巴金。尽管他在生活中和工

作中常常遇到一些困难和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也有一些反对他的人，但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对前途是充满信心的，他热爱自己的事业和亲人，因而他也是幸福的。

作者是以生活本身的规律刻划拉姆津的性格变化的。如果说瓦西里耶夫不是完人，那么拉姆津也不是天生的坏蛋。年轻时他比瓦西里耶夫似乎更有才华，玛莎本来更爱他，这也不是偶然的。炮兵连长阵亡后，被任命为代理连长的又是他，而不是瓦西里耶夫，这也是不无原因的。但是，拉姆津的父亲是三十年代肃反运动的受害者，而师长的粗暴和主观主义的错误指挥，阴险的上士对他的诬陷都是使他在战斗中被俘的客观原因。然而，作者强调的是决定拉姆津走入歧途的内因——他锋芒毕露，孤芳自赏的弱点。这种高人一等的个人英雄主义，一时的感情冲动和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在关键时刻战胜了义务感和责任感，使他作出了错误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改变，拉姆津的个人主义变成了冷酷、阴郁的宿命论和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他和瓦西里耶夫重逢时说道：“我恨政治，所以，我不属于任何人……现在用什么诱饵也不可能把我引诱到手了，我既不往右，也不往左……我离开了奶奶，离开了爷爷，哪儿也没有上帝了。”拉姆津标榜自己是一块“中间地带”，但他却离开了祖国，遗弃了母亲，因而，他说的另一句话倒真实地暴露了他灵魂深处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可悲的孤独的人，我们都难免一死”。拉姆津的极端个人主义已使他深深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小说正是通过两位主人公的不同命运提出人生的意义这一中心主题的。人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将决定人们的选择，人们的选择也将决定他的一生是否具有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政治性、哲理性很强的小说。

作者在小说中还涉及了许多苏联社会内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课题。画家瓦西里耶夫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艺术和艺术家的使命的理解反映了今天苏联艺术家在创作探索中的得失和文艺界内部的思想斗争；导演谢格洛夫的永远发不完的牢骚是知识分子对四十年代以来苏联社会生活中许多敏感问题的心理反应，尽管他的许多议论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他比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比柯里岑教授这种一心往上爬的艺术界官员要高出一头。小说提出的社会生活问题十分广泛，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们的热烈反响和讨论。由于小说提出了许多带哲理性的问题，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选择》可称之为“沉思小说或思考小说”。作家米哈尔科夫则认为这部作品“力求探究人生的道德本质，理解经常需要作出道德选择的现实”。文艺界公认小说《选择》、冈察尔的小说《你的霞光》(1980)以及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决定着八十年代的文学发展倾向，是今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定向座标”。

小说《选择》已经被提名为1983年度全苏列宁文艺奖金和国家文艺奖金的候选作品，并已改编成话剧正在莫斯科小剧院上演。

王 燎 潘桂珍

第 一 章

客人们都走了，家里顿时显得一片寂静。前厅里，穿衣镜两侧的壁灯还亮着，各房间里的吊灯也没熄灭，落地灯微暗的光线透过雪青色灯罩在沙发床上面柔和地照射着。到处是香烟味和陌生的香水味，乱放着的沙发椅，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地毯上乱掷着点燃过的火柴梗，高脚杯里是没喝完的鸡尾酒和麦管，厨房里是堆积如山的盘碟——这一切给人以淡淡的凄凉之感，也使人想起了家里进行过的一场没完没了的令人不快的杂乱无章的谈话。

关于艺术的无休止的高谈阔论，谄媚和讨好的微笑早已把瓦西里耶夫弄得筋疲力尽了。他把妻子的最后一批客人送上电梯之后，便怀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系上她的围裙，过分殷勤地动手收拾起餐厅里的盘碟来了。但玛丽娅用恳求的目光要他住手（“现在不要……”），她往长沙发椅上一坐，交叉着双手抱住两肩，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窗外是一片漆黑的二月之夜。

“感谢上帝，终于都走了，”她说，“我简直都站不住了。”

“你知道几点钟了？”他心焦地问了一句。“快两点了……真可以！还好，你没把请客的缘由告诉他们。否则，人们会没完没了地祝酒，直到天亮。到底是怎么回事，玛莎，是庆祝你的命名日吗？”

“我累坏了，”她抽了一口烟，心不在焉地对他微微一笑道，“谢谢你，亲爱的……别提这个了。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值得注意……晚安！我要一个人坐一会儿。你去睡吧，请吧……”

他觉得她言不由衷。她这句惯用的亲昵话“不值得注意”也好，她在社交沙龙中常说的“谢谢你，亲爱的”这句话也好，都似乎为她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快和敬而远之的矫揉造作的面纱，把她同他隔离开来；这种情形在他们之间发生争执时就特别明显，而这种争执过去是很少发生的，一旦发生，它会使人好象站在摇摇晃晃的大桥上头晕目眩，六神无主。

“好啦，沃洛佳，请你去睡吧，你去吧，”玛丽娅用有气无力的固执口吻又说了一遍，她把那支尚未熄灭的香烟放在烟灰缸边，给自己斟了一点红葡萄酒，“如果你想认真跟我谈谈有关我的朋友的什么事情，请你现在不要谈，我不想谈这个……”

“我同你的朋友们并不熟，玛莎。”

“也许正因为这样，今天你很讨人喜欢，你使所有的女客都着迷了。”

她呷了一小口酒。他看见她的喉部动了一下，嘴唇上

留下了一片湿润的红色痕迹，这两片嘴唇的亲密温柔的味道他是很熟悉的。

“玛莎，你说什么？女客人？着迷了？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求求你，我们还是别说话了……”

不，他不记得过去送走客人之后有过这种情况：她一个人这样一条腿搭着另一条腿地坐在长沙发上，心不在焉地喝酒，若有所思地抽烟，摇晃着尖头拖鞋。如果这发生在四个月以前，他会认为这是妻子向他提供的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为了开心地乐一下）。这是从某部外国的庸俗影片，无聊的闹剧中学来的，是妻子为主管部门的采购委员会审片时翻译的作品。他会象过去有时发生的那样，听到妻子含笑地慢声慢气地说：“好，先生，我们已经送走了客人，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我们现在干什么呢？你要去画室，还是同妻子在一起呢？”现在他不期望听到这样的话了，而只是迷惑不解地看着玛丽娅如何深吸一口烟之后慢慢地喝一口酒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勇气对她这种故做姿态的任何挑战表示惊奇，因此，他只是以开玩笑的笨拙口吻说：

“你是不是喝多了点儿，玛莎？你不舒服吗？”

“天啊！”妻子忍痛似地垂下双睑，于是他看到她的睫毛被泪珠儿压得下坠了。“难道你对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不懂吗？我想单独坐一会儿。请你谅解，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暂时忘掉人间的一切……”

“对不起，玛莎。”他面带愧色地说了一句，便走出房间。

蜡烛形的青铜色壁灯象节日般的照亮了走廊和前厅，在夜深人静的住宅里，这些壁灯显出轻佻和善于熬夜的样子；穿衣镜的银色反光投射在放有电话机的小桌旁边。瓦西里耶夫匆匆地瞅了一眼穿衣镜中自己那张双眉紧蹙、疲惫而又苍白的面孔（“我最好现在到画室去……”），然后，便顺手把镜子两侧那些时过半夜的电气装饰品熄灭了，镜子立即变得神秘而又黑咕隆冬的了。他在前厅慢吞吞地穿上那件最暖和的短皮外衣。冬天，他很喜欢穿这件外衣乘车去野外写生；他又慢条斯理地拉上了皮靴拉链，他暗想，夜已经深了，去画室是没有意义的。然而，玛丽娅却默不作声，既没表示挽留他，也没到前厅送他出门，她没象平时他们两人之间习以为常那样，把面颊凑过来让他亲吻。

“我走啦，玛莎，”他是尽量用平时说话的口吻说这句话的，并力图使自己相信，没有发生任何严重问题。“我到外面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晚安！”

“再见！沃洛佳，明天一早我打电话给你。”玛丽娅在客厅里用客气有礼、几乎是温柔的声调回答。于是他走到门外，用自己的钥匙把门锁上了。

在已经入睡了的这座大楼的第八层楼的黄色灯光下等候电梯时，他听见一阵压低了的笑声和时断时续的耳语声；他朝窗口那边望去，发现在暖气片旁站着一对男女（这是常有的事），他觉得那个少女的身材有些眼熟，接着就清清楚

楚地听到女儿在用惊奇洪亮的声音问他：

“爸，你上哪儿去？你为什么走了？”

在这样晚的时候看到这个年纪已经不轻的大个子演员斯维托扎罗夫同女儿在一起，他心中不太受用。这是个满头黑发的美男子，讲笑话的能手，他嗜酒如命，又是个赌棍，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作风象个轻歌剧里寻花问柳的风流郎。因此，瓦西里耶夫对女儿这种天真无邪和过于不分香臭的性格感到十分痛心，而且不寒而栗。

“大概你该去睡了，维卡，”^①瓦西里耶夫说道，他非常好奇地打量着斯维托扎罗夫，“而您这位相貌非凡的年轻人，似乎也该把苏联大学生放走，她七点钟就要起床去上课。”

“维克托利亚，您应该听长辈的话，”斯维托扎罗夫用深沉的男中音开口道，他装出一副懂事听话的样子，“弗拉季米尔·阿列克赛耶维奇，我求您宽宏大量，原谅我这次意外的深夜谈话……如果我知道哪怕一个还收留人的修道院地址，我就准备进修道院赎罪。但我找不到忏悔的地方。”

“您不必去修道院了，请您跟我一起乘电梯走吧。我将告诉您怎么办。”

“爸爸，别说了！”维克托利亚笑道，“又要开始训人啦！阿纳托利讲了许多可笑的故事，我开心得笑个没完！您

^① 维克托利亚的小称。

听说过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排戏的笑话吗？是关于马萨尔斯基和叶尔绍夫的故事。您没听说过？去演戏的时候，他们在舞台上是按‘布莱克’旗的指挥蹦蹦跳跳的，您知道吗？”

“我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瓦西里耶夫用嘲弄的口吻朝斯维托扎罗夫看了一眼，后者却在一眨眼之间又装出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那样，全神贯注地等着对方讲话，“您，阿纳托利，还没嗑够牙吗？舌头不累吗？请您看一下手表，您这位修道院的爱好者。依我看，在这种时候还聊天，不太合适吧。”

“嗑牙？哈哈！您这是怎么说的？”斯维托扎罗夫有礼貌地表示惊奇道。“我没懂您的意思，弗拉季米尔·阿列克塞耶维奇，我是个无知的人！您说我的什么东西还没累来着？”

“我指的是，您是在没完没了地说废话。”

“您对我太狠心了，可为什么呢？这不公平！我是无辜的人！”

“我很遗憾。”

（我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在需要克制的时候总是发脾气呢？……）

电梯开来了；电梯里灯光明亮，但给人以凄凉之感，它散发着冬衣和寒冬的气味，地板上残留着人们带进来的雪水，瓦西里耶夫走进这间二十世纪舒适的机器房间。电梯把他往楼下送去，经过别人的一套套住宅，这些住宅已进入梦乡，直到早晨它们都是静悄悄的。瓦西里耶夫皱着

眉头闭上了眼睛，想着浪费掉的时间和整个晚上在家里说过、做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毫无意义。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他必须很有教养地反驳那些妄自尊大的客人们，他们一会儿肯定艺术中的特殊准则，当然，包括绘画的特殊准则，一会儿又（为了心安理得）在自己的议论中转而坚决拥护生活中那些奥妙的、有争议的问题。他突然想到，他近来不止一次地隐隐约约地产生了一种令人心醉的愿望——找个机会离开莫斯科，时间要长一点，离开几个月，一年，五年；有那么一天，他将毫无留恋地离开家或者离开画室，定居在蓝色的沃洛格达河畔，不慌不忙地观察生活中的自然景象和原始事物，同渔民们生活在一起，吃农村中的粗茶淡饭，描绘多云的北方风景和渔民们的朴实肖像，绘出他们那被太阳晒黑的爱喝伏特加酒的面孔……

近两个月来他在工作上很不顺手。他连续几个小时地躺在发出极其熟悉的弹簧嘎吱声的旧长沙发椅上，读托尔斯泰晚年写的《日记》，完全被这位伟大人物痛心疾首的自白迷住了。但是，瓦西里耶夫后来强迫自己以怀疑的心情对这一切表示冷淡，恢复了自己心情的平静，觉得强迫自己过朴素生活乃是一种骗局和现代生活中的荒诞现象。但有时，在他的想象中出现的那个远离莫斯科和喧嚣尘世的避风港，在经过清醒思考后，只不过是一个起镇静作用的“世外桃源”，不过是在一定时间内居住着一位艺术界名流的旅游胜地或疗养区而已。他很清楚，任何名利思想也不能驾驭年已五十四岁的他了（其实几年前他也是这样），

但只有两个不可摧毁的强烈嗜好除外，这就是对饱经摧残的自然界的粗糙而又温柔的美的热爱和对工作的发狂的忠贞；工作是他自愿去做的一种甜蜜苦役，对于他来说，没有这一切就失去了任何生存的意义。

在他工作不顺手的日子，当他处于无精打采和冬眠状态，他可以轻易地相信自己的才华（如果他过去有过这一才华的话）已经死亡，已经丢失了；而在这样的阴暗日子，听惯了的对自己的各种崇高的评价和表扬，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言过其实和虚伪的东西，而参加每届画展（“您的东西必须在那儿展出呀”）则成了多此一举的事情，尽管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过晚。至于说到从十五年前起人们非常高兴地聘请他去国外展出一事，他觉得，在某大学或私人沙龙中举行的展出招待会已经不那么令人神往了。在这一类招待会上，总有许多出口不逊的批评家和毫不客气的记者。但是，使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关于“传统派”和“现代派”的尖锐对话。在这种时候，他边喝着鸡尾酒，边听着人们的议论，便逐渐产生了反对“炫耀博学”和空谈的既开心而又憎恶的感情，他也半认真地开始争论，否定那些使他厌恶万分的现代派，他故意用超现实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与之对比；在这之后，他又以好奇的心情观察着争论的新变化，这时，便出现了混乱不堪的高谈阔论，这种混乱就象新旧世界中当代绘画界的混乱情景一模一样。当然，这类争论不是斯多噶派的对真理的追求（在怀疑一切的时代谁敢指出真理何在呢？），而是一种